

文學血脈的薪火——

蕭紅與魯迅的父女情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六

文史工作者 ◎ 蔡登山

學者錢理群說蕭紅是「命薄如紙，卻心高於天」（注1）。的確，打從她出娘胎，便被置於以父親為象徵的冰冷家庭和以祖父為象徵的溫暖世界的兩極中。這些在她的作品如〈家族之外的人〉、〈永恆的憧憬與追求〉、《呼蘭河傳》都有述及。後來在祖父的支持下，她終於衝破父親、繼母以及未婚夫家庭的阻擋，離開偏遠的呼蘭縣，來到哈爾濱的第一女中讀書。從中學生活開始，她經歷了祖父去世、逼婚逃婚、受騙懷孕，直到陷於哈爾濱東興順旅館，面臨被賣入妓院的絕境。蕭紅經歷了心理上並未成熟為女人，但身心均已遭受屈辱的光景。一九三二年，二十一歲的蕭紅在絕境中遇到蕭軍，他們相愛並同居。（兩人的結合曾經為蕭紅帶來幸福，但這幸福後來卻褪了色，甚至最終轉化為苦痛，當然這是後話。）一九三四年五月，蕭紅在愛路跋涉中，和蕭軍千里迢迢地從哈爾濱搭乘「大連丸」郵船，流亡到關內，然後輾轉來到青島。這一年的九月，蕭紅在青島寫完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生死場》。這期間，生活是艱苦的，舉目無親；而文海茫茫，到處都是險阻。蕭紅想起了她所崇仰的長者——魯迅，她懷著不安和希冀的心情給魯迅寫了一封信（當然，同時寫信的還有蕭軍），另外她又附上了剛剛抄就的《生死場》和當年在哈爾濱印的《跋涉》。不久，魯迅的覆信來了，他果然沒有拒絕這位陌生女孩的求援。這對於在人生旅途中，過早地受盡奚落的蕭紅而言，不啻是在大海沒頂前的援手。於是她用僅剩的一點錢，再次漂流來到上海。不同於她的漂流關內，這次她是滿懷希望的。

那是「歷史性」的一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兩點鐘。蕭紅按照魯迅信中指引的路線，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她輕輕地推開了書店的門，內心激動得撲通撲通的跳著，雙眼緊緊地尋覓著，一位巨人般體魄，壯偉風采的長者，那是她從匕首投槍的文章中想像的身影。但她萬萬沒想到，眼前出現的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老人，他樸素平凡得很，甚至有點不修邊幅。魯迅一見他們來了，手裡拿起一頂舊氈帽，腋下夾著一個紅花黑花格的布包，先開了口：「我們走吧」，說完便帶頭走出了內山書店。在街上，魯迅健步走在前頭，最後走進附近一家咖啡店，他領著蕭紅與蕭軍找到一個角落坐下來，要了一壺紅茶。這小店座位不太多，光線也不充足，簡直顯得有些冷清。魯迅倒常到這裡來，然而並不是為了喝咖啡，因為店主人可能是個猶太人，中國話聽不太懂，而且只要客人一到，他就打開唱機放起音樂來，這樣，談

起話來是很方便的。魯迅經常在這裡同左聯的一些朋友商議事情。坐了不大一會兒，許廣平領著海嬰也來了，她是爲了照顧魯迅的安全而來的，同時也是爲了看看蕭紅。（多年以後，許廣平在《憶蕭紅》中寫道：「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裡，我們初次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鬥、喜悅，時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麼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臨別時，許廣平握住蕭紅的手，依依不捨地說：「見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麼時候再見了？」。在當時魯迅已被國民政府當局通緝四年了，他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和他們會面的，蕭紅以感激的眼神深情地望著。在漂流無依中她已看盡了世間冷酷的面孔，而眼前的老人帶給她的是多大的安慰與溫暖……，她甚至還看到，在這陰冷的初冬天氣裡，老人卻只穿著一件單薄的舊棉袍，腳下穿著一雙舊的膠底帆布鞋，脖子上連一條圍巾也沒有。當老人掏出早已準備好的二十塊錢（那是蕭紅來信所要借的），霎時蕭紅感覺眼眶有些潤濕。就在這一刻，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父」與「女」兩代人會合了，他們之間整整相距了三十年，但確有著薪火相傳的文學血緣。

看著《生死場》，魯迅吃驚於蕭紅對生活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更吃驚於看上去還有點纖弱的蕭紅，卻能把「北方人民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描繪得「力透紙背」。於是魯迅拿著書稿，就「託人把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處可以公開出版的書店來接受出版它。」「文學社曾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裡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在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魯迅總是耐心地安慰著蕭紅，最後還是魯迅從日常生活裡節省出錢來，以「奴隸社」的名義爲蕭紅印行這本書。魯迅並親自爲這本書寫了序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爲「奴隸叢書之三」的《生死場》，以實無其店的上海容光書店出版了。之後，它再版不下二十次，《生死場》奠定了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這其間有著魯迅的一份功勞。因此有人說，在那個陰雲遮天的苦難年代，沒有魯迅，也就沒有蕭紅。她可能默默無聞地寂寞下去，失望和頹唐甚至會毀掉她。

魯迅以沈重的筆觸「畫出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並要改造這民族靈魂。當他讀完《生死場》後，他預言這部小說將擾亂「奴隸的心」。魯迅的文學血脈似乎在這裡得以傳承。學者皇甫曉濤說蕭紅是繼魯迅後，第一個能夠如此鎮定地面對死亡的中國現代作家（注2）。她一再地寫死亡，寫輕易的、無價值的、麻木的死，和生者對於這死的麻木。在這裡，人民死於生產、死於戰鬥、死於「蚊蟲的繁忙」和傳染病；更多的卻是死於不該死去的人類對自身、對他人的冷漠、暴虐和毫無主張。在這裡「人死了聽不見哭聲，靜悄悄地抬著草捆或是棺材向著亂墳崗子走去，接接連連的，不斷……」。在蕭紅看來，這片關東大地，最可痛心、最驚心動魄的是它的「蒙昧」、「麻木」，那是生命價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費。小說令人髮指地描繪道：「亂墳崗子，死屍狼籍在那裡。無人掩埋，野狗活躍在屍群裡。太陽血一般昏紅，從朝至暮蚊蟲混同著蒙霧充塞天空。高粱、玉米和一切菜被人丟棄在田園，每個家庭是病的家庭，是將要絕滅的家庭。全村靜悄了。植物也沒有風搖動它們。一切沈浸在霧中。」這使我們不禁想起魯迅小說

〈藥〉的最後出現的死寂的墳場，而蕭紅則更進一步逼視那渾噩的「死」和無聊的「生」。它將人推到非人的最後邊緣的同時，也將其「生」的意識放到「死」的地獄之火來灼烤。它第一次如此淋漓盡致地大膽裸露生命的軀體，讓它在紛擾繁殖的動物和沈寂陰慘的屠場與亂墳崗中舞蹈著，恰如魯迅的〈野草·墓碣文〉中「窺見死屍，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臉上都絕不顯哀樂之狀，但朦朧如煙然」，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時，面對死亡所顯示出的哲人的睿智和文化反省。它是一個失卻生命活動的民族，看著自身屍體時，「被大蠱惑，倏忽間記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幾多年，遂同時向著人間，發聲反獄的絕叫」（魯迅〈失掉的好地獄〉）（注3）。於是我們看到那些互相隔絕的人們逐漸靠攏、匯集，「一起向蒼天哭泣」，「共同宣誓」，「大群的人起來嚎啕」——在敵人的鐵蹄威脅下，人們也許是第一次發現彼此間有了休戚與共的命運。而那使「藍天欲墜」的吶喊——「我是中國人」，讓麻木如動物般的人們，第一次感到了人的尊敬、民族的尊嚴。我們古老的民族畢竟是有生命力的，它終於獲得一顆「猛壯」的、「銅一般凝結」的「心」。《生死場》從「死」的境地，逼視中國人「生」的抉擇，在熱烈的騷動後面，是比一潭死水還讓人戰慄、畏怯的沈寂和單調、孤獨和無聊，是一種「百年孤寂」般的文化懺悔和文明自贖。

而和《生死場》同屬姊妹作的《呼蘭河傳》，蕭紅寫的無疑是個悲劇，然而呼蘭河人的不以悲劇為悲劇的木然無謂，才是真正的悲劇。這正如同魯迅小說中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無個性就是他們的個性，無思想就是他們的思想，無意識就是他們的意識，無目的就是他們的目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他（她）們又總是「多數」的存在。古往今來，直接死於統治者屠刀下的人少，更多的卻死於「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的不見血的「謀殺」之中（注4）。魯迅對他們曾「哀其不幸」、曾「怒其不爭」，而蕭紅則在他們對生死的漠然中，寫出了「幾乎無事的悲劇」。蕭紅在對歷史的思索，對國民靈魂的批判，和魯迅有著心靈上的契合！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的《魯迅日記》寫著：「晚廣平治饌為情吟錢行」。（蕭紅為愛所苦，她要遠去日本，許廣平親自下廚，為她做了幾樣小菜。）臨別之夜，魯迅望著即將孤身遠行的蕭紅，他憐愛地坐在藤椅上囑咐蕭紅：「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會嚇唬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驗病的來啦，來啦……』」蕭紅凝神地聽著，但有誰料到，這竟是這對宛如父女的最後訣別呢！三個月後的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了，消息很快傳到了日本。蕭紅在〈海外的悲悼〉文中說：「二十一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很希望我是看錯……雖然去的時候是留著眼淚。……我想一步踏了回來，這想像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孤獨了的人是多麼可怕！……」。次年蕭紅返回上海，她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魯迅的墓。她寫下了〈拜墓詩——為魯迅先生〉，詩云——

跟著別人的腳跡，
我走進了墓地，
又跟著別人的腳跡，
來到了你的墓邊。

那天是個半陰的天氣，
你死後我第一次來拜訪你。
我就在你的墓邊豎了一棵小小的花草，
但，並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只說一聲：久違。

我們踏著墓畔的小草，
聽著附近的石匠鑽著墓石的聲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葉跳躍了起來，
我哭著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著正義。

你的死，
總覺得是帶走了正義，
雖然正義並不能被人帶走。

我們走出了墓門，
那送著我們的仍是鐵鑽擊打石頭的聲音，
我不敢去問那石匠，
將來他為著你將刻成怎樣的碑文？

蕭紅對魯迅的崇敬，使她下決心要用自己的筆描繪出魯迅的音容笑貌。一九三八年她先寫了〈魯迅先生記·一〉，接著又寫了〈魯迅先生記·二〉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九年，也就是魯迅逝世三週年時，她又用了全部心力寫了《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後來重慶婦女生活社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出版單行本時，改名為《回憶魯迅先生》。真摯的情感和優美的文筆，使得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不僅在所有魯迅回憶錄中獨領風騷、出類拔萃，就是在整個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一流的文學作品，我們看一段她描寫魯迅在夜間寫作的情形，就可見一斑。

「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闔一闔眼睛，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許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邊睡著了。（許先生為什麼睡得這麼快？因為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鐘就要起來管理家務。）海嬰這時也在三樓和保姆一道睡著了。

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是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

檯燈下開始寫文章了。

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的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

有時許先生醒了，看著玻璃窗口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麼亮了，魯迅的背影不像夜裡那樣黑大。

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裡。

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著書包，保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保姆總是吩咐他說：「輕一點走，輕一點走。」

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著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著魯迅先生花園的莢竹桃，明亮亮的。

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著。

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

蕭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觀察和罕見的天賦，描繪出魯迅極其生活化的一面，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感其情，她寫出一個活生生的魯迅。

一九四〇年十月，爲了紀念魯迅逝世四週年，蕭紅又奮筆寫了大型啞劇《民族魂》，刊登在楊剛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這個劇本共四幕，魯迅和他筆下的人物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單四嫂等人都出場了。儘管此時蕭紅的病體已很衰弱，但她的筆是永遠離不開魯迅的！

一九一一年蕭紅自中國最北方的城市——呼蘭縣走來，一九四二年她又在中國最南方城市的一角——香港淺水灣，寂然歸骨，總共才活了三十一個寒暑。這之於他人正是青春美麗的年華，而對於蕭紅，卻是追求、奮鬥、掙扎而又含恨而終的短暫、痛苦的一生。當日本人佔領香港時，蕭紅在半個月不到的時間裡，輾轉在四家醫院的病床中，捱不盡恐懼與病痛折磨，終於死在法國醫院設在聖士提反女校的臨時救護站。兩個男人——她愛的或愛她的，把她火化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黃昏，她的骨灰被葬在淺水灣的海邊。五〇年代的淺水灣曾是喧鬧而優美的海水浴場，在博浪歡愉之際，人們大概記不起這裡的「藍天碧水永處」，曾經埋葬一顆早醒而寂寞的靈魂。就如同詩人筆下的感喟（注5）：

「……

而漫長的十五年，

小樹失去所蹤，連墓木已拱也不能讓人多說一句。

放在你底墳頭的，

詩人曾親手爲你摘下的紅山茶，

萎謝了，

換來的是弄潮兒失儀的水花。

淺水灣不比呼蘭河，
俗氣的香港商市街，
這都不是你的生死場……」

蕭紅風風火火地從中國默默的北方一隅，跋涉到當日的文化中心——上海，她來到魯迅的身邊，她以她年輕生命所煥發的才華光芒，令當日文壇爲之目眩。然後她經歷愛情上的悲歡離合，她寂寞悲苦的逝去。她的一生有如曳著耀眼光芒的雷電，滾過密雲期的中國文壇，是瞬間輝煌之後的一道虹彩；她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記憶中，是鮮明的永存的，當然在那呼蘭河畔，更有著她鮮活的身影。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大後方的蕭紅給許廣平的信談到魯迅時說：「我們這裡一說起就是導師導師，不稱周先生，也不稱魯迅先生，你或者還沒有機會聽到，這聲音是到處響著，好像街上的車輪，好像檐前的滴水……。」而許廣平在〈追憶蕭紅〉文中：「每逢和朋友談起，總聽到魯迅先生推薦，認爲在寫作前途上，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這些話已不是相互間的恭維，而是真正上的血脈相連。錢理群就指出（注 6），在「寥如晨星」的女作家中，與現代文學的宗師魯迅最爲相知的，竟是最年輕的蕭紅。

注釋

注（1）（4）（6）：錢理群《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歷程》，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注（2）（3）：皇甫曉濤《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注（5）：盧瑋鑾〈寂寞灘頭〉，收入《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